

# 市场扩展与崛起国对外战略<sup>\*</sup>

高 程◎

**【内容提要】** 工业化时代的大国崛起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力与财富的积累；二是利用所积累的实力和财富，获取霸主地位或者重塑国际秩序。在崛起过程中，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实力积累不足时就急于对现有秩序发起强烈的挑战，而另一些国家即使已获得实力与财富方面的优势仍无意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本文认为，大国的对外战略有深厚的经济动因并遵循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考虑，与霸主国争夺权力或取得霸主地位不是所有崛起大国的主要目标；当经济崛起的路径受阻时，崛起国更可能采取激烈的手段挑战现有秩序；当通过市场竞争等方式可以实现经济崛起目标时，崛起国不倾向于以激进的方式挑战霸主国和既有国际秩序。本文对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和工业化进程中的美国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中国崛起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崛起国 对外战略 工业化 市场扩张

**在** 工业化时代，大国崛起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力与财富的积累；二是利用所积累的实力和财富，获取

---

\* 在本文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周方银、孙学峰提供了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作者谨此表示感谢。本文的初稿曾于2011年5月2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的崛起战略：理论与历史”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感谢与会者对本文的评论与建议。文中的疏漏及不足之处由作者本人负责。

---

《国际政治科学》2011/3（总第27期），第1—43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霸主地位或者重塑国际秩序。但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是,有些国家如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在其实力积累还颇有不足的时候,就急于对现有秩序发起比较强烈的挑战;而另一些崛起国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在已获得巨大的实力与财富方面的优势时,仍在相当长时期内无意取代现有霸主或者挑战当时的国际秩序。为什么在崛起国的行为方式中存在这样的差异?特别是在实力积累尚有不足的情况下,采取激烈的方式急于挑战现有霸主,其成功率往往不高,为什么这些国家不等待更为有利的时机?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崛起国不同的战略选择?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 一、对大国崛起战略的现有解释及其不足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关于大国崛起及其对外战略选择的讨论主要是在霸主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和战略互动,以及由此引发的霸权战争的框架下展开的。

权力转移理论者认为,与霸主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导致崛起国选择武力方式挑战霸主国的根源。<sup>①</sup>按照权力转移理论的基本逻辑,崛起大国通常会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满,主导性大国则会努力维持现有秩序以确保既得利益,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与冲突将随着二者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而加剧。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当不满于既有秩序的崛起国认为有机会赢得主导权的时候,它们将选择以战争手段加速权力转移,争取创造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安排,以便从这种与其实力相称的新体系中获益。<sup>②</sup>奥根

---

① 最早关于某种特定类型的力量对比必然引起霸权战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的著作。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力量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②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Ch. 1;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2nd ed., p. 123;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 7.

斯基 (A. F. K. Organski) 最初认为, 当挑战国实力高度接近主导国, 以至即将取代主导国之际, 战争爆发的几率最高。<sup>①</sup> 此后, 他又修正了早先的看法, 指出战争更可能发生于霸主国与崛起国权力转移之后, 特别是“竞争者”刚超过原来“主导者”的时候。<sup>②</sup>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权力转移理论追随者的研究结论兼容了这两种观点, 认为霸主国与崛起国权力高度持平阶段, 特别是双方实力对比达到 5:4、或者权力超越后达到 4:5 时战争的风险最大。<sup>③</sup> 塔门 (Ronald L. Tammen) 认为, 在权力转移之前战争的可能性最大, 而最严重的霸权战争将发生在权力转移实现之后。<sup>④</sup>

由于过于关注权力的兴衰, 权力转移理论将崛起国是否选择诉诸战争, 简单地归结为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为了提升理论对历史经验的包容性, 权力转移论者引入了满意度这一变量, 将崛起国区分为满意现状国家与不满意现状国家。<sup>⑤</sup> 不过这一区分同时也带来了更为深刻和复杂的理论问题, 因为人们通常难以从客观尺度上区分大国满意的程

①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②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ed., p. 333;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 59 - 61. 关于权力转移在没有实现挑战者超越主导者之前, 战争可能性较小的观点参见 Jacek Kugler and Frank C. Zagare, eds., *Exploring the Stability of Deterrence*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0)。

③ 有关战争将更可能发生在权力高度持平期的观点, 参见 Douglas Lemke and William Reed, “Regime Types and Status Quo Evaluations: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2, No. 1, 1996, pp. 143 - 164; Lemke and Suzanne Werne, “Power Parity, Commitment to Change, an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0, No. 2, 1996, pp. 235 - 260。

④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p. 28 - 29.

⑤ 按照权力转移者的定义, “满意国家”对于主导国家维护的国际规范、利益分配现状以及意识形态没有挑战的动机和欲望; 而“不满意国家”则试图打破现状并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在他们看来, “满意国家”和“主导国家”权力持平时不会发生战争, 只有强大的“不满意国家”才会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引发战争。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Ed., pp. 313 - 320; Organski and Kugler, *The War Ledger*, pp. 19 - 23, 39; Douglas Lemke, “Towards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Parity and War,”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14, No. 2, 1995, p. 145; Douglas Lemke and Jacek Kugler,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Perspective,” in Kugler and Lemke, eds.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 21。

度,<sup>①</sup> 满意或者不满意的程度会因为具体情况、面临的问题和领域而有所不同,而且一种体系中满意现状的国家不一定会对另一种体系感到满意。<sup>②</sup> 满意变量的引入冲淡了权力转移理论的核心变量,使其理论框架变得过于富于弹性而降低了解释力。

同样基于霸权国与崛起国关系的分析框架,吉尔平(Robert Gilpin)对霸权更替与世界秩序变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霸权国家的实力下降,将导致国际体系的无序状态。这时,崛起国的战略目标将主要围绕如何击败霸主国并取代其地位而展开。这种体系失衡的结果是引发霸权战争,进而导致世界体系的变革以及新霸权的产生。在吉尔平看来,争夺霸主地位的过程将使崛起国获得在原有国际体系中无法获得的地位和回报,并由此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因而崛起国有强烈的动机通过战争改变既有国际体系。<sup>③</sup>

尽管对权力和国际体系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在“霸主国/崛起国”关系的分析模式及其对霸权战争的判断上,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和霸权转移逻辑具有相通之处。在分析崛起大国的对外行为时,现实主义者的逻辑是,首先假定最大化占有世界权力是大国对外行为的终极目标,而权力扩张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军事优势,进而根据这一假定推导出如下结论:当崛起国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走上权力争霸的

---

① 一些学者试图将“满意国家”与“不满意国家”的界定标准进行量化。如金宇祥使用竞争者和主导国家的盟国之间所表现的相似度作为衡量“满意”和“不满意”的数据指标。莱姆克通过竞争国与主导国的国内结构相似度作为衡量指标分析竞争国对主导国的“满意度”和“不满意度”。但由于“满意”和“不满意”本身过于主观,这些量化标准的选择在说服力方面都存在置疑,而且这些研究并没有找到多少对于“不满意”实际发生作用的量化结果。参见 Woosang Kim, “Alliance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p. 833–850; Douglas Lemke and Suzanne Werner, “Power Parity, Commitment to Change, and War,” in Jecek Kugler and David Lemke, eds.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② 杰克·利维“中国崛起与权力转移理论”,载于朱锋、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1—32页。

③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道路。无论是基于对权力本身的天然欲望和诉求，还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崛起国的主要对外目标都在于最大限度地通过权力扩张来争取改变国际秩序以及取代现有的霸主，而崛起国无限制的权力扩张将最终导致其与霸主国之间的武力冲突。<sup>①</sup> 特别在以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看来，对崛起国而言，财富只是获得安全的保证，扩张安全所依赖的军事力量才是其终极目的。<sup>②</sup> 崛起国为达到军事安全方面的目标，通常需要确立地区霸权，而防止离岸地区霸权的产生又是霸主国的战略重心，这使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sup>③</sup>

科普兰（Dale C. Copeland）的研究挑战了权力转移理论、霸权稳定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流派关于崛起大国的扩张战略导致军事冲突的判断。他认为全球性冲突往往起源于那些自认为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相对地陷入不可逆转的衰退趋势的主导性军事大国针对崛起大国所发动的预防性战争。尽管对大战的原始动力问题提出了深刻而富有新意的见解，但科普兰的结论仍然建立在霸主国和崛起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将引发大战的逻辑上。<sup>④</sup> 科普兰的理论解释存在以下不足：首先，他的理论无法解释美国这一明显的反例。他不能有效解释为什么当时其他大国没有对迅速崛起的美国发动预防性战争。历史经验表明，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力量及潜在力量已经取得相当优势时，欧洲列强仍然不大关注美国力量的动态变化。美国的案例说明，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动态差异”因素并不一定导致大国安全威胁认知的产生，从而成为其选择武力手段的根

---

① 汉斯·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门洪华、孙英春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Eric J. Labs, “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Aims,”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4, 1997, pp. 1 - 49; Colin Elman, “Extending Offensive Realism: The Louisiana Purchase and America’s Rise to Regional Heg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No. 4, 2004, pp. 563 - 576。

②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81—98页。

③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6章。

④ 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黄福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源。其次,科普兰的动态差异理论同样不能很好地解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经济力量及潜在力量不可逆转地处于下降趋势的英帝国为何没有向逐渐获得欧洲大陆“准霸主”地位的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19世纪90年代之后,德国在钢铁、化工、电力等重工业领域开始逐渐占据优势;1906—1910年间,德国制造业占世界的份额也已开始赶超英国。而此时的英帝国在欧洲地区仍采取孤立的对外政策,与此同时继续将其战略重心放在离岸地区的制度与市场扩张方面。

最后,科普兰的研究主要以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大陆的经验为基础,其解释范围同样难以超越欧洲大陆特殊的结构和地缘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几个实力大致相当、地理上彼此临近的欧洲大国正处于恶性竞争的关系中。这一特殊的生存环境令崛起中的大国难以将安全和经济因素相互剥离。<sup>①</sup>甚至在某些特定阶段,安全与经济被视为同一硬币的正反两面,因为巨大的安全威胁会使崛起国感到经济方面取得的成果和优势难以得到有效保全。然而,当时欧洲的情形只是诸多国际格局中特殊的一种。而且,即便在两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大陆,科普兰的逻辑在适用范围上也有其局限性。这一分析框架在解释希特勒时代德国发动的战争时或许能自圆其说。<sup>②</sup>但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欧洲准霸主发动的预防性战争,

---

① 这种过度的不安全感,在俾斯麦的回忆录中表露无遗。他特别提到,由于“德意志帝国处于中心和无屏障的地理位置,国防线伸向四面八方,反德联盟很容易形成”,所以德国始终面临严峻的安全问题。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2卷)(杨德友、同鸿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9页。

② 关于希特勒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因,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显然有完全不同的见解。按照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约给德国造成的巨大的经济灾难和财政负担是导致希特勒上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结果及其延续。参见约翰·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张军、贾晓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在凯恩斯的框架下进行相关讨论的文献参见 Etienne Mantoux, *The Carthaginian Peace, o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Keyn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2); Sally Marks, "Reparations Reconsidered: A Rejoinder,"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2, No. 4, 1969, pp. 356-365; Charles S. Maier, *Recasting Bourgeois Europe: Stabilization in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in the Decade after World War I*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Herman J. Rupieper, *The Cuno Government and Reparations, 1922-1923: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8)。

这一判断值得商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德国在此前二十几年即已开始的军事扩张战略密不可分。事实上在威廉二世时期，正处于崛起阶段的德国便表现得急于挑战现有秩序。这意味着德国对外政策的转向是在其获得欧洲大陆准霸主地位之前。那时德国经济力量正处于迅速上升阶段，在安全方面对俄国潜在力量的担忧尚不是其对外战略的主要考虑因素。因此，科普兰将德国这一时期的对外战略选择纳入到预防性战争框架中进行解释，显得说服力不足。

阎学通和孙学峰从另一角度研究了大国崛起的战略选择问题。他们认为，在崛起国扩展体系影响力的同时，由霸权国主导的体系将对崛起国施加安全压力，由此制约崛起国实力的增长和影响力的扩展。因此，崛起国要想成功崛起，必须有效缓解“崛起困境”。他们发现，当崛起国与霸权国实力差距较大时，崛起国采取战略冲击程度弱的战略比较容易获得成功；而当崛起国实力超越霸权国（超过 1.25 倍）时，崛起国采用战略冲击程度较强或战略冲击程度很强的战略才有成功崛起的可能性。<sup>①</sup>由此产生的一个应该加以解释的问题是：既然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力度较大的方式强行崛起成功的可能性非常渺茫，这些国家（如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为什么会采取这一策略？与此同时，为何另一些国家（如 20 世纪初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在取得明显的实力优势后，为何并未以高强度的战略冲击当时的霸主国？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不仅要思考“什么样的战略更容易实现成功崛起”，还要追问，是什么因素导致一些国家选择了这样的崛起战略，另一些国家选择了其他的崛起战略，这些战略选择背后是否有着具有一致性的动因？

总之，现有理论解释大多是从霸主国与崛起国之间的互动逻辑出发，并且在解释霸主国与崛起国之间关系时，存在较为明显的霸主国中心论倾向。这种霸主国中心论体现在整个分析视角是通过霸主国的思维逻辑来透

---

<sup>①</sup> 阎学通、孙学峰等《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孙学峰《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1816—1991）》，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5 年。

视博弈对手即崛起国的对外行为。崛起国对外行为的主要目标被锁定在与霸主国的权力争夺上。大国的崛起战略，通常被置于武力冲突或战争的框架下进行讨论。这些分析忽视了崛起国自身目标函数的复杂性，特别是崛起国所面临的内部及外部约束条件的差异对不同崛起战略选择的影响。这种分析视角上的缺陷将导致对崛起国对外行为逻辑的理解偏差。如果我们以崛起国本身的偏好为基点，对其对外行为逻辑进行讨论，那么大国崛起过程与武力扩张战略之间的关联就需要被重新审视。

从这种意义上说，很多既有的研究往往假设了崛起国的“权力扩张行为”，而忽视了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目标函数与外部环境的差异，忽视了崛起国权力扩张背后的经济根源和经济逻辑。尽管奥根斯基等学者意识到，工业化进程会使不同国家出现增长差异，而这种“生产能力和物质资源”的相对变化又决定了大国间实力的再分配。<sup>①</sup>但在他的理论框架中，经济因素只是导致实力对比变化和权力转移的客观原因，而不是推动一个国家选择不同崛起战略的根源。这样的分析往往强调权力竞争的零和博弈逻辑，而忽视经济因素对崛起国战争选择的重要塑造作用。

## 二、大国崛起战略的市场逻辑

本文认为，工业化时代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特别是在财富和实力积累阶段，对外战略选择的基础性目标是实现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为此，获得广义市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里，广泛意义上的市场包括产品的销售市场、资源和生产资料的购买市场，以及与生产和销售密切相关的对外投资市场和货币流通市场等。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及不同历史时期，大国对于不同的市场领域会有不同的侧重。从历史经验看，崛起时期的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其扩张战略首先是为了获得崛起所需要的

---

<sup>①</sup>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ed., pp. 345-346.



销售市场、资源和生产要素。同与主导国家进行权力角逐相比，崛起国对外行为的内生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对外部空间的诉求首先立足于经济崛起目标。<sup>①</sup> 因为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在于，在高速增长的经济“起飞”阶段，其统治的稳定性和统治者的业绩及国内利益结构的平衡等，主要来源于经济实力的壮大；国家财政收入和外部影响力的上升也主要依赖于外部市场。通常只有当经济崛起的路径遭到霸主国或其他竞争性大国的有效阻挡时，崛起国与这些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之间的权力争夺才被提上更重要的议程。

在追求经济崛起目标的过程中，大国对外行为遵循成本—收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对大国而言，崛起环境的差异将导致不同类型的战略选择在投入—产出比方面的差异。在面临不同战略选择时，有些大国的战略空间较大，而另一些国家的战略空间很小。由此，对于一国来说是有效的战略选择，对于另一国来说可能不符合经济理性，甚至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崛起国是否采取扩张性战略，具体选择何种扩张手段，以及把扩张的重点放在何处，主要建立在最大化实现其广义市场目标所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之上。争夺霸主地位或通过武力扩张战略改变现有秩序，并不是崛起国必然的战略选择。

工业化时代大国实现崛起目标主要依赖于领土扩张、直接掠夺、构建秩序和自发扩展的外部市场交易行为四种典型的对外战略或其组合。这四种对外战略模式都是崛起国为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不是针对霸主国或竞争性大国的主导权展开的。前三种战略选择需要崛起中的大国在对外行为中积极作为，而且通常需要伴随国家军事力量的介入，是具有强制性扩张性质的对外战略。第四种战略是通过自由竞争市场的自发扩展和演进而实现的，总体上是非强制性扩张性质的对外战略。强制性市场扩张和自发性市场扩展方式之间具有相互替代作用，它们本质上都是为了以最小

---

<sup>①</sup> 关于国内因素对于大国对外战略的影响，参见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主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刘东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的代价占有、扩大及深化广义的市场规模，以达到崛起的目标。崛起国是否选择强制性扩张方式，以及具体选择何种强制方式，取决于初始经济条件约束下的成本—收益最大化考虑。

在谋求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大国还将面临可能降低其获得经济收益的外部阻力或威胁。这种外部阻力或威胁主要来自其他大国。缓解外部世界对本国崛起的不满和威胁感，降低它们为阻碍本国崛起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几率，使外部力量对本国来自外部市场的收益产生尽可能小的负面影响，是崛起中大国对外行为的防御性目标。当尚未遭遇强劲的安全威胁和外部压力时，崛起国的战略重点主要是如何扩展广义市场的规模和提高其质量，安全目标不是影响其对外战略选择的主要因素。然而，当外部安全压力足够强大时，崛起国的经济诉求和安全防御目标可能合二为一，后者因成为确保前者的必要手段而受到充分关注。

依照大国不同崛起战略选择背后的经济逻辑，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有别于传统“霸主国/崛起国”关系框架下的基本判断。

第一，与霸主国争夺权力或取得霸主地位不是所有崛起大国的压倒性目标，至少不是大国在财富积累阶段的主要目标。在崛起过程中，大国选择扩张性战略往往不是围绕主导国家在“霸主国/崛起国”零和博弈的框架下制定的。崛起国的扩张性战略通常是立足于国内经济需求，以在外部世界获取及扩展广义市场为目标。

第二，大国的崛起战略不一定都要放在争霸战争的框架下讨论。因为通过战争或武力手段获得霸主地位，不一定能使崛起国实现收益最大化。发动针对霸主国的霸权战争或以激进的方式挑战国际秩序只是大国崛起战略选择中的一种。大国采取激进崛起战略的一种可能性在于，该战略是各种可能的崛起战略中最经济的战略；或者，在严峻的崛起环境压力下，采取强硬的方式挑战霸主国以改变既有国际秩序，是大国实现经济崛起目标唯一可能的战略选择。

第三，当经济崛起的方向和路径受阻的时候，而不是与霸主国实力对比接近的时候，崛起大国更可能采取强硬手段，并表现得急于挑战现有秩

序。崛起路径受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崛起国难以继续获得内部发展所必需的外部经济条件；二是崛起国预期难以守住自身现有的崛起成果。有些崛起国在实力积累阶段就急于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正是由于如果它们采取和平竞争的方式，经济实力可能根本积累不起来，甚至现有的实力积累的成果也难以保住。

第四，当通过和平竞争方式可以实现经济崛起目标时，崛起国总体上不倾向于以武力扩张的方式崛起，会努力避免以激进的方式挑战霸主国和既有国际秩序。崛起国在霸主国或其他竞争性大国权力争夺的核心地区之外推行扩展战略更符合经济理性，且容易获得成功。当广义市场自发扩展的收益率高于强制性市场扩张的收益率时，崛起大国会倾向于通过市场交易行为实现其崛起目标。此时理性的大国将采取非扩张性的崛起战略。

以下我们将以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和工业化进程中的美国为案例，对上述解释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对这两个案例的选择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它们是足够重要的案例。其次，它们在其他替代性解释给予了高度关注，同时也是争议较多的案例，在与这些替代性解释比较的过程中，有助于更好地辨别不同解释的说服力，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解释的效力。再次，它们的崛起时间在很大程度上重合，这控制了国际大环境这一背景性因素的作用，便利了我们的比较。最后，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和工业化进程中的美国构成了两种非常典型的情况，德国在实力不利的情况下本应避免陷入与英国的权力争夺，但在经济考虑的压力下不可逆转地走上了争霸的道路；另一方面，美国本来有颇为充分的争夺权力的资本，却因经济环境的有利因素，而迟迟没有参与争夺世界霸权的游戏，长期安于二流国家的地位。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经济考虑与安全因素、权力考虑的不同作用。

### 三、海外市场扩张与德国威廉二世对外战略的转型

德国是在实现工业崛起过程中，急于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典型例子。

19世纪90年代,德国的物质实力尚未全面超过当时的霸主英国,<sup>①</sup>便开始通过海外扩张,试图挑战国际利益格局。德国试图改变现有秩序的努力引起其他欧洲大国的担忧,导致其试图联手限制德国实力的继续上升。这种紧张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人们通常把近代史中的德国看做军国主义产生的策源地,并认为这种思想的形成与德国民族的特质存在某种密切的关联,<sup>②</sup>但这难以解释为什么军国主义会在那一时期滋生并广泛蔓延。事实上,曾任德国外交大臣及帝国宰相之职的伯恩哈德·冯·布洛早在1895年便预见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历史的灾难性进程,并提出如下一直困扰历史学家的问题:19世纪90年代之后的德国为何不能通过继续推行俾斯麦时期的均势外交战略来为自身谋求一个与其国家实力相当的世界地位,并由此避开战争的祸患?<sup>③</sup>为了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们需要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对外战略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正值俾斯麦下台与德皇威廉二世开始主政,因此德国崛起战略的转型,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祸根往往被研究德国的外交史学家和其他史学家归咎于威廉二世个人的扩张野心和欲望。<sup>④</sup>在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体系的形成及其悲惨后果正根植于1890年俾斯麦去职、威廉二世掌权后德国对外政策的愚蠢和冒进,它导致欧洲处于极其不稳定和脆弱的状态中。<sup>⑤</sup>黑尔维

---

① F. H. 欣斯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物质进步与世界范围的问题1870—18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0页。

② 战后流行于欧洲的一种理论将战争的起源追溯到德国第二帝国的建立,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是德国推行独裁的军国主义的必然结果。见George W. F. Hallgarten, *Imperialismus vor. 1914: Soziologische Darstellung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 (Munich: C. H. Beck, 1951; revised ed. 1962)。转引自C. L. 莫瓦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世纪力量对比的变化1898—194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183页。

③ 约翰·洛尔《皇帝和他的宫廷——威廉二世与德意志帝国》(杨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200页。

④ 约翰·洛尔《皇帝和他的宫廷——威廉二世与德意志帝国》,第199—238页。

⑤ George F. Kennan, *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 Franco-Russian Relations, 1875 - 189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希甚至认为，从俾斯麦领土方面“心满意足”的外交政策向海外强势扩张战略的转型，体现了威廉二世和其海军首脑蒂尔皮茨“非理性的”、“古怪的”观念，及以此为基础的“战略无常”。<sup>①</sup> 这些观点过分强调个人偶然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军事扩张战略背后的经济动因。

相比那些将 19 世纪末期德国的对外行为视为个人或国家偏离理性所致的解释，我们认为，导致德国战略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德国工业化进程发展到对外部市场产生巨大需求时，海外主要市场已经基本被其他欧洲列强瓜分完毕。无论就商品销售还是资源、原料购买而言，德国的市场准入成本和交易成本都很高，以致其崛起的进程受阻。因此，德国有很强的动力通过海外军事扩张的方式改变当时的利益格局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市场分配份额，以获取本国工业继续发展所需要的外部市场。

自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普鲁士德国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实力上升使德国在欧洲地区迅速崛起。<sup>②</sup> 在 1870 年普法战争结束之后，俾斯麦政府试图将德国塑造成一个“心满意足的国家”。如何维护已有的国际地位，并守住业已获得物质成果，是此时德国决策者最关心的议题。为了守住现有成果，俾斯麦政府采取了温和的战略，尽量不去触动现有的国际利益格局，最大限度地利用英国、俄国和法国在欧洲及离岸地区的矛盾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德国有意在海外避免与欧洲其他列强，特别是与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这一时期，保全欧洲地区的和平秩序，避免欧洲其他大国联合阻碍其国内的工业化进程，对德国而言是首要之事。德国决策者清醒地意识到，德国的利益就是“尽可能地防止战争或限制战争的范围”。对此，俾斯麦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应该努力公正地和热

---

<sup>①</sup> 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时殷弘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70、289 页。

<sup>②</sup> 该时期德国工业化被罗斯托等经济学家成为经济“起飞”阶段。该理论参见 W·W·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理论》（郭熙保、王松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11 页《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黄其祥、纪坚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5—22、108—154 页。关于 19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初德意志（普鲁士）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情况参见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王庆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369—380 页。

爱和平地来运用我们的强大力量，以便缓和因为我们变成真正的强国所引起的不满情绪，从而使全世界相信，德国在欧洲的领导权要比法国、俄国或英国的领导权更为有益，更为公正，并且对其他国家的自由较少损害。”<sup>①</sup>

由于外交政策的重心在欧洲大陆，德国在处理海外问题上明显表现得非常谨慎。为防止对外政策在执行中带来的危险，俾斯麦曾宣称德国不会推行海外殖民扩张<sup>②</sup>并于1889年1月26日在帝国议会的讲话中强调，德国把英国当做“无利害冲突的传统老盟友”，并希望“在殖民地问题上能巩固一百五十多年来同英国的关系”。<sup>③</sup>此时，对德国决策者来说，海外殖民同欧洲本土利益相比只是枝节末端问题。<sup>④</sup>为了防止与英国之间的摩擦，德国曾选择主动放弃在中东和非洲的离岸特权，由此换取与英国之间的友好关系。<sup>⑤</sup>

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这种温和崛起战略在国内需求的压力下变得越来越难以实施。事实上，这种压力并非从威廉二世主政时期才开始。在俾斯麦执政后期，决策者已不由自主地被这种趋势推动。依据俾斯麦本人的外交理念和立场，他希望德国避免卷入任何国际纠葛之中。他对欧洲以外的地区没有太多野心，对海外扩张持保留态度，反对为德国制定一套帝国主义国际政策，以免卷入海外殖民地的争夺，特别是由此引发德国与英、法两国的直接冲突。在他看来，一方面海外扩张战略必然触动当时的国际秩序，并可能由此破坏德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另一方面，作为当时主导阶级，即容克地主及其所拥戴的陆军力量的利益

① 俾斯麦 《思考与回忆》(第2卷)，第229—230页。

② 齐世荣等编 《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兴衰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2页。

③ 艾伦·帕麦尔 《俾斯麦传》(高年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1页。

④ Mary E. Townsend, *The Rise and Fall of Germany's Colonial Empire, 1884 - 1918*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⑤ 详见欣斯利编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第709—733、766—767、786—787、797—799页。

代表，俾斯麦对于代表新兴工商业利益的海外殖民诉求与海军力量的相互结合和助长感到忧心忡忡。<sup>①</sup>然而，在工业化的财富积累使得19世纪80年代德国开始需要大量输出资本的时候，面对经济扩张压力，作为保守势力代表的俾斯麦在某种程度上也顺应了国内工商业力量的海外需求。1882年德意志殖民协会和1884年德国殖民地协会的成立和其他海外商业政策的变化，反映了俾斯麦政府对外战略的适度调整。俾斯麦本人对殖民扩张的反对态度也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他不无感慨地谈道“我必须为此后数十年里我的同胞的未来着想……殖民地将意味着德国工业和商业扩张赢得新市场，为德国人的活动、文化和资本赢得新场所。”<sup>②</sup>利用英国与法、俄两国之间的海外冲突，德国在埃及和亚洲问题上对英国予以支持。在德英关系改善的背景下，德国在1884—1886年间趁机在西南非、西非、东非、南太平洋等列强边缘利益地区获得少许“保护领地”。到1889年时，这些地区大都已变成德国皇家的殖民地。

19世纪90年代之后，德国国内对海外军事扩张的需求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仅仅立足于欧洲本土的外交政策已经难以维系。当海外经济利益对德国的崛起变得日趋重要时，长期置身海外利益争夺重心之地以外的策略遭到德国内部力量的强烈敌视和阻挠。<sup>③</sup>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俾斯麦的下台埋下根源。在其执政后期，俾斯麦基于自身极其特殊的地位，才有能力暂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德国殖民扩张的巨大动力。俾斯麦的继任者，甚至包括新皇威廉二世本人，在面对德国工业化的历史洪流时，都无法继续担当这一“驯兽者的角色”。<sup>④</sup>因此，俾斯麦的倒台是德国对外战略转型诉求的结果，而非其原因。

俾斯麦“心满意足”的欧洲政策最终被抛弃，体现了迅速发展的新

① 详见欣斯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第383页。

② Townsend, *The Rise and Fall of Germany's Colonial Empire, 1884 - 1918*, p. 120.

③ 汉斯-乌尔里希·维勒《德意志帝国》(邢来顺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④ 汉斯-乌尔里希·维勒《德意志帝国》(邢来顺译)，第155页。

工业国家的迫切需要。持续扩张的工业资本主义从德国内部破坏了其外交政策中关于“满足”状况的誓言，因为德国不可阻挡地被卷入国际经济和世界市场之中。<sup>①</sup> 所有重要的经济统计均表明，19世纪90年代以后，工业生产在德国开始居于全面支配地位，<sup>②</sup> 钢铁、化工、电力等重工业部门迅速崛起。<sup>③</sup> 1873—1894年间，德国工业总产量从266亿马克增加到454亿马克；而1895—1913年则从489亿马克增加到1000亿马克。1870年时，德国工业净投资仅为14亿马克，到1890年时已急剧增长至450亿马克。<sup>④</sup> 此后，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开始接近并赶超当时的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英国。1900年，德国超过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工业生产国。<sup>⑤</sup> 1906—1910年间，德国制造业能力占世界份额的15.9%，而英国为14.7%。<sup>⑥</sup>

势如破竹的工业化进程使德国国内无法容纳强劲的经济增长所释放的能量，德国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对外部市场严重依赖的经济外向型国家。<sup>⑦</sup> 在此之前，德国的工业化进程主要依靠本国及欧洲市场，其资源供给和消费大致可以满足德国的工业生产和国内就业。然而，随着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内市场逐渐难以消化不断扩展的生产能力，德国对

① 汉斯-乌尔里希·维勒 《德意志帝国》(邢来顺译)，第162—163页。

② 经济史学家通常把19世纪50年代之后德国工业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1850—1873、1874—1894、1895—1913。克特拉·博查德 《1700—1914年德国的工业革命》，《欧洲经济史》(第4卷：工业社会的兴起，上册)，卡洛·M. 奇波拉主编(王铁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7—98页；R. H. 蒂利 《19世纪德国的资本形成》，《剑桥欧洲经济史》(第7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上册)，彼得·马赛厄斯、M. M. 波斯坦主编(徐强、李军、马宏生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关于这三个阶段德国工业化进程的论述详见该书第95—130页。

③ 参见 Brian R. Mitchell, *European History Statistics, 1750 - 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Table D8, D18, D22。关于德国工业更为详细的数据，以及与同时代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比较可参见 B. R. 米切尔编 《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年)(贺力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7—601页。

④ 维勒 《德意志帝国》，第29—30页。

⑤ 欣斯利编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第59—60页。

⑥ Paul Kennedy,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 - 1914* (Atlantic Highlands, NJ: Ashfield Press, 1987), p. 357.

⑦ 欣斯利编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第374—375页。



外部资源、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需求急速膨胀。<sup>①</sup> 19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状况变得格外突出。1890—1895年是世界经济的萧条期,德国和欧洲市场的消费能力明显萎缩;与此同时,1873—1895年德国的人口却一直迅猛增长(从4160万上升至5200万)<sup>②</sup>。通过海外市场的扩展恢复国内的经济繁荣和就业,成为维持德国经济实力相对上升趋势的紧迫需要。1895—1896年经济萧条结束后,德国确立了自己在工业生产方面的领先优势。<sup>③</sup> 因此,在1896—1913年世界经济高度繁荣期间,工业主导部门以及大企业和大银行在海外史无前例的投资机遇将德国经济拖入高涨的旋涡之中。过剩的生产能力使德国国内工商业力量和劳工继续赋予海外贸易很高的期望值。<sup>④</sup> 他们对海外市场,特别是中东和远东市场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兴趣。<sup>⑤</sup>

德国对外战略的转型正是受19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利益诉求变化的引导,而并非俾斯麦和威廉二世个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所致。在历史的转折期,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对外政策背后主要体现的并非他们个人的主观偏好和政治倾向。有较为充分的证据表明,统治初期的威廉二世并没有意图挑战由英国主导的世界殖民体系,而是试图拉近与英国的关系。1889年8月,刚刚主政的威廉二世便亲自率领德国舰队访问了英国,在怀特岛上的奥斯本宫受到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接见。德皇这一举动在当时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亲英的信号。过了不到一年,1890年6月,德国和英国签订了划分两国在东非和西南非势力范围的《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sup>⑥</sup>。该条约的内容在两国国内都被视为是德国对英国做出的重大让步。按照英国新闻

① 1872年时,德国的原料进口仅为570万马克,到1910年时增加到16130万马克,增长约28倍。参见齐世荣等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兴衰史》(上卷),第404页。

② 维勒《德意志帝国》,第26页。

③ 欣斯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第59—60页。

④ 维勒《德意志帝国》,第31—32、154页。

⑤ 欣斯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第77页。

⑥ 该条约规定德国在东非把桑给巴尔苏丹的领地维塔和索马里海岸的德属领地让给英国,还调整了多哥和英属黄金海岸之间的边界,保证英国人免税通过史蒂文森路穿越德属东非;作为交换条件,德国从英国手中获得了北海的赫尔果兰岛。

记者史坦莱德的比喻,英国通过该条约“获得了一件簇新的燕尾服,而付出的代价只是裤子上的一個纽扣”。<sup>①</sup>一向在海外注重与英国建立良好关系的俾斯麦也为此条约扼腕叹息,认为这一交换得不偿失,在他看来,新皇以这座对德国经济利益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商埠为代价,唯一想换取的补偿便是英德关系的良性发展。<sup>②</sup>不可否认,威廉政府有意亲英的重要目的在于,通过建立与世界最强大的海上霸主之间的良好关系,为本国日后在海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相对良好的环境、开辟更多的空间。

尽管极力向英国释放友善的信号,并试图证明自身没有挑战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意图,但从德意志帝国统治者对外和对内的全局考虑,为了维持国内经济持续增长而采取海外扩张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理性选择。从外部环境看,保持国内经济实力的上升势头是为了确保在欧洲大陆的实力角逐中不丧失相对优势,而这一目标在当时面临很大的外部压力。尽管1870年德国已经超过其欧洲大陆的传统竞争者法国,在普法战争击败法国并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后,这种优势变得更为明显,但是令德国统治者更为忧虑的是克里米亚战争溃败之后开始步入工业化进程的俄国带来的潜在竞争压力。俄国的人口2倍于德国,并同处高速工业化增长时期。<sup>③</sup>这种压力使德国统治者需要借助于海外市场的扩张来摆脱经济萧条给国内带来的衰落预期,保持经济向上发展的势头,以保证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除了应对外部竞争压力之外,海外扩张战略的推行在当时的德国具有更为深刻的国内根源。特别在国内市场发育不完善、对生产的吸纳能力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情况下,海外不发达地区提供的销售和投资机会为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对国家决策者和工商业界的精英而言,各种不同形式的海外市场扩张行为所带来的现实收益及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是恢复和保持经济繁荣,以及维护市场信心的唯一出路,也是国家物质福利和生产性阶层获得利润的主要依托。这一规律同样支配着晚一步实现工业

① 齐世荣等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兴衰史》(上卷),第408页。

② 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3卷),第119—120页,详见该书第11章。

③ 科普兰《大战的起源》,第78页。

化的德国经济。在社会层面，对于帝国统治阶层，海外扩张战略也是缓解国内社会矛盾和冲突、保持统治合法性唯一有效的策略。<sup>①</sup> 当时德国的统治阶层已经普遍感受到国内利益冲突的尖锐，并认为“如果不能为德国劳动的剩余产品打开有常态性的、宽广的销售渠道”，则德国“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步伐一起向前”。<sup>②</sup> 总之，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海外利益已经成为帝国增长的动力，是实现帝国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双重目标的理想模式的保障。

迅速工业化导致的高度外向型经济推动德国迫不及待地去海外寻求新的原料产地、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放市场。在这股强力的驱动下，19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德国国内对外机构的建设、对外政策的制定以及帝国财政投入的重点都从欧洲本土转向海外。<sup>③</sup> 德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海外殖民地基本被其他欧洲强国瓜分完毕。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手段实现海外市场的扩张，则德国崛起的方向和路径将受到严重阻碍，于是，零和博弈逻辑的重要性在德国的崛起战略调整中被凸显出来。显然，19世纪90年代才被迫卷入扩张浪潮的德国错过了开辟海外殖民地的黄金时段，它需要通过战略调整来逆转不利的形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威廉二世政府试图改变国际利益分配格局的“世界政策”开始推行。身处德国的马克斯·韦伯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及其背后的经济根源和冲突。他在1894年写道“在一段看似和平竞争的过渡期后，贸易扩张已明显即将到达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权力将独立决定每一个国家能在地球上瓜分多少经济控制权，也将决定其人民的活动范围，尤其是其工人赚钱的可

<sup>①</sup> 参考桑德拉·哈尔珀琳《现代欧洲战争与社会变迁：大转型再探》（唐皇凤、武小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章、第177—180页。

<sup>②</sup> 一些学者认为，当时德国政府对工商业集团的支持，也是为对付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预防策略目标的需要。为了稳定社会下层限制其力量，德国政府必须依赖各保守派政党和团体结成的联盟，而后的主要财政支持者之一便是国内大工业家。该利益集团借此形成集体行动，推动政府出台海军扩张计划，以满足他们在海外的经济诉求。维勒《德意志帝国》，第152—154页；克雷格、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第58页。

<sup>③</sup> 关于德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导致海外扩张的必然性的论述，可参见加田哲二《德国社会经济史》（徐汉臣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1—299页。

能性。”<sup>①</sup> 1897年12月6日，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比洛夫在帝国议会上的著名演讲为威廉政府旨在争夺海外市场的所谓“世界政策”做出了如下合法性辩护：“德国人让他们的一个邻国占有陆地，另一个邻国得到海洋，而自己只是自命清高地仰望星空的时代已然过去。……我们不希望将他人排挤到阴影中去，但是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世界政策”显然与工商界精英的核心利益诉求是高度契合的。正如泛德意志协会主席克拉斯在《假如我是皇帝》一书中急切表达的那样：“如果说某一个国家有理由关心如何扩大它的势力范围，这个国家就是德意志帝国。……我们需要工业品销售地区和工业原料产地。”<sup>②</sup>

帝国的海军扩张政策最能体现德国崛起战略的新方向。为了推进海外的军事扩张，自19世纪90年代起，德国投入到“新海军主义”的扩张浪潮之中。德国对于海军大国地位的谋求标志着其对外战略的重大转折。这一对外政策的特点表明，它在实现战略调整以努力适应工业帝国时代的国际政治新形势和国内利益诉求。

在此之前，德国对外政策的注意力和利益诉求一直集中于欧洲大陆，建设和发展保护本土安全、确立在欧洲大陆军事优势的陆军是其军事战略的重点。时至19世纪90年代，尽管德国的对外贸易已仅次于英国位居欧洲第二，但其海军力量不仅远远落后于英国，而且排在法国、俄国和意大利之后。<sup>③</sup> 1888年，德国海军的年度经费只有6500万马克。然而，19世纪90年代之后，德国在海军建设方面的投入与在陆军方面的投入相比，形成了压倒性优势。1897—1900年，德国海军开支以每年13.7%的速度增长，同期陆军开支的年增长速度仅为2.1%。尽管帝国的军事费用逐年增长，但1897—1911年间，帝国对陆军的实际投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sup>④</sup>

① 转自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第59页。

② 齐世荣等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兴衰史》（上卷），第404—405、409页。

③ 欣斯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第387页。

④ Imanuel 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 - 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ooks, 1976), p. 79; 克雷格、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第270—271页。

在 1897—1914 年间，帝国未偿还的债务从 21 亿马克上升到 52 亿马克，而新增的 31 亿马克债务中有 10 多亿用于海军花销。<sup>①</sup>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年代中，德国 60% 的军事预算花费到海军建设上。<sup>②</sup>

德国军事投入不断从代表主导阶级的陆军利益向新兴阶级的海军利益倾斜，从贵族容克地主阶级的立足于欧洲大陆的外交政策向工商业阶级的海外诉求转移，表明了德国的海外扩张战略与其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及其需求之间的密切关联。来自海外市场的利益决定了德国发展对外贸易以及与之相应的海军军备政策的原则性方向。这种调整主要不是统治者个人的偏好所致，它建立在国内的主导性需求和利益博弈基础上。这一博弈又受到德国工业化发展的经济过程左右。

德国新兴工商业阶级是海军建设最积极的支持者，其在议会中的代表不愿再为陆军部继续提供庞大的财政支出。<sup>③</sup> 较之 19 世纪 80 年代俾斯麦执政时期，对于扩建海军舰队的强烈需求在工商业界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这种热情形成了聚合力量。<sup>④</sup> 在威廉二世及其任命的海军部首领蒂尔皮茨决定将德国未来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发展海军之前，汉堡的工商业精英们已经开始积极推动海军的扩张计划。凯尔（Eckart Kehr）注意到，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精英集团也以高涨的热情加入到支持海军扩张计划的工商业界大军中。<sup>⑤</sup> 因此，海军扩张计划并不是“固执的德皇的突发奇想”，而是“代表了德国社会中最繁荣和最富有活力的成员的巨大的经

---

① Peter-Christian Witt, “Reichsfinanzen,” in Herbert Schottelius and Wilhelm Deist ed. *Marine und Marinepolitik im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891 – 1914*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72), p. 151, 转自戴维·德乌戈、罗纳德·罗戈父斯基 《英德海军竞赛与宪法“适应性”比较》，载于罗斯克兰斯、斯坦主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第 79 页。

② 维勒 《德意志帝国》，第 150 页。

③ 关于土地贵族与商业精英之间在海军计划问题上的分歧程度，详见 Geoff Eley, *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Reinterpreting the German Past* (Boston: Allen & Unwin, 1986), Chap. 5.

④ 维勒 《德意志帝国》，第 145 页。

⑤ Eckart Kehr, *Schlachtflopp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894 – 1901: Versuch eines Querschnitts durch die Innenpolitischen, Sozialen und Ideologischen Voraussetzungen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Berlin: Verlag Emil Ebering, 1930), p. 306, 转自德乌戈、罗戈父斯基 《英德海军竞赛与宪法“适应性”比较》，第 75—76 页。

济利益和社会志向”。<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对海军扩建战略最为积极和坚定的工商业精英人士，也是德国社会中向来主张和平发展贸易，以及最为亲英阶层的成员。正如汉堡—美国航运公司主席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所坦言，甚至像他这样的亲英分子都投身于海军计划，放任由此所导致的英德关系紧张局面。<sup>②</sup> 在发展英德友好关系还是进行海外扩张的问题上，推动德国海军扩张战略的主导性集团与威廉二世所显示的政治倾向，特别是他们的亲英立场，从侧面证明当时的海军扩张战略是受德国国内经济形势的压力和海外巨额利润的诱惑所驱动，而不是立足于与欧洲列强特别是与英国进行霸权争夺。

最终，帝国最高统治者决定让海军建设取代陆军建设作为帝国的军事战略方向，这是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此消彼长的客观结果，是德国的核心经济利益依赖于海外贸易市场的扩大这一经济逻辑的结果。1889年，德国工业经济的国内净产值开始与传统的农业经济拉平，并以不可逆转的趋势拉开与后者的差距；1895年，德国工业净产值以6.5:5.1的比例明显超过农业产值。正是在这一趋势的压力下，帝国决策者以一种妥协的方式，将不断提高的保护性关税（特别在农产品问题上）作为交换，确立了海军扩张的战略方向。由此，农业和工商业精英阶层在建造大规模海军的战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德国对外贸易和军备政策的未来走向也得以确定。<sup>③</sup>

在帝国最高决策层，海军扩张计划是以反复无常著称的威廉二世始终坚持、一以贯之的少数目标之一。他设置了独立的海军部，并于1892年授予他的海军参谋长冯·蒂尔皮茨海军上将与陆军顾问相同的地位。1897年，威廉二世任命蒂尔皮茨为海军部首领，并全力支持他的扩张性海军建

① 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 - 1914*, p. 79.

② Lamar Cecil, *Albert Ballin: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 1888 - 191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52 - 162.

③ 维勒 《德意志帝国》，第29—30、146—148页。

设计划，同时任命积极支持东亚殖民扩张计划的冯·比洛为外交大臣，后者于1900年出任帝国首相。由此，海军舰队积极扩张计划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为了进一步加快海军发展，帝国议会于1898年通过了第一个扩建海军法案，于1900年通过了第二个扩建海军法案，于1906年通过第三个扩建海军法案；此后，又在1908年和1912年分别通过新的扩建海军法案。<sup>①</sup>

帝国决策者从国家层面对德国迅速缔造强大海军的解释和目标定位是：德国海军必须有助于满足重工业、造船工业和国内生产性阶级的物质需求，服务于开辟海外市场并且保护这些市场的安全、以便捍卫德国的经济利益。<sup>②</sup>蒂尔皮茨于1894年写道“没有一支能够发动攻势的舰队，德国就不可能发展世界贸易、世界工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公海捕鱼、世界交往和殖民地。”他的这一观念为威廉二世所特别赏识。<sup>③</sup>皇帝曾公开表示，一个民族的海军应当与它的海上商业相匹配，而德国没有做到这一点，以至于法国和俄国的海军合起来“就能够封锁德国的海岸线，摧毁德国的贸易”。<sup>④</sup>因此在他看来，有必要通过强大的海军舰队保护“德国在海上运输的成千上万的价值”。<sup>⑤</sup>

帝国海军战略背后深刻的经济根源正如保罗·肯尼迪揭示的，尽管继承了普鲁士“北方斯巴达”的头衔，但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却朝着雅典那种依赖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和粮食进口，必须以强大的海军保护重要的贸易路线的政策方向发展。在崛起的过程中，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和阻力随时牵动着德国从决策层到生产性集团、再至社会层面敏感的神经。当

---

① 维勒 《德意志帝国》，第146—149页。

② 维勒 《德意志帝国》，第145页。

③ 欣斯利编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第313页。

④ Ivo Nokolai Lambi, *The Navy and German Power Politics, 1862 - 1914* (Boston: Allen & Unwin, 1984), p. 34.

⑤ Ekkehard B? hm, *überseehandel und Floppenbau: Hamseatische Kaufmannschaft und deutsche Seerüstung 1879 - 1902* (Düsseldorf: Bertelsmann Universitätsverlag, 1972), p. 81, 转自德乌戈、罗戈父斯基 《英德海军竞赛与宪法“适应性”比较》，第75页。

张伯伦在英国产业界的强力推动下于 1902 年提出“帝国优惠”(Imperial Preference) 计划后, 恐惧和不安的情绪在德国高层和精英集团中蔓延。在他们看来, 早先是占据世界一大半面积而且最富有经济价值的英国殖民地, 如今是英国本土都随时可能对德国的贸易进行封堵。<sup>①</sup> 这显然进一步坚定了德国决策者对于海军扩张战略必要性的判断。

海军扩张战略立足于德国海外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争夺, 以及海外军事基地建立及扩展。军舰要在遥远的海域处于临战状态, 需要军火和食物供应、船坞设施、海军营房和医院等一系列完善的海军基地所应具备的一切设施。因此, 德国政府为了对本国工商业的海外利益予以支持, 试图在世界各地建立海军基地。<sup>②</sup> 德国海外市场扩张的步伐随着海军的扩建而加快, 其触角伸至远东、南太平洋、中近东和非洲, 令其昔日盟友感到它们在这些地区已经建立的势力范围及特权遭遇挑战。凭借迅速发展起来的一支力量仅次于英国的海军舰队, 德国在短短十几年里迅速崛起为海外殖民新贵。到 1914 年时, 德国拥有的殖民地面积已达到 100 多万平方英里, 所辖人口为 1500 万。<sup>③</sup>

尽管德国的海军扩张战略是立足于海外经济利益和自身的经济崛起目标, 而不是为了击败英国海上力量、取代其全球地位。但是该战略在当时被认为冲击了英帝国的核心利益, 德国也由此被视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世界霸权的争夺者。进入 20 世纪之后, 德国的海军扩张计划成为英德冲突的主导因素, 并导致德国通过《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努力争取的英德关系逐渐破裂。作为海上霸主, 维系海军优势被英国视为关乎帝国生命存续的重大问题。而海军扩张战略在德国则被看做是维护其至关重要的海外经济利益的立足点, 是德国通过经济崛起使整个社会实现正常运转的基础。正如前文所述, 德皇和一贯秉持亲英立场的工商业精英们在本

---

① Kennedy,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 - 1914*, pp. 328 - 329.

② 欣斯利编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1 卷), 第 310 页。

③ 克雷格、乔治 《武力与治国方略》, 第 57—58 页; 齐世荣等编 《15 世纪以来世界九强兴衰史》(上卷), 第 411—414 页。



国经济扩张需求的压力下，均无法放弃扩建海军及海外扩张战略。因此，围绕限制军备议题的英德谈判自 1909 年开始持续到 1912 年，却注定毫无结果。<sup>①</sup>

关于英德之间对立局面的形成，霍布斯鲍姆指出，德国试图通过建立一支具有威慑力的海军迫使英国承认其通过扩张获得的海外市场；而英国的战略目标则要极力避免他国力量进入那些它已通过贸易和资本予以主宰的海外世界超过半数的领地。由于英国力图维持既有海外利益格局，而德国急于改变现状，因此即便德国不是有意针对英国，也必然导致两国关系的紧张。这种紧张关系在德国工业竞争的压力催化下，导致英国将德国视为其最危险的潜在敌人，并试图通过与法、俄的结盟限制德国的发展和壮大。<sup>②</sup> 英国决策层在 1890 年后深信，德国的海外扩张战略是针对英帝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尽管这一观念与实情并不相符，但它导致了英国上层将德国视为未来的敌人而非竞争者的思维定式，并进而在这一群体中形成了“在不久的将来，德国和欧洲之间必将有一场霸权大争夺”的共识。英国决策层由此断定，英国必须与德国的对手结盟来遏制德国的崛起进程。1904 年的英法协约和 1907 年的英俄协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sup>③</sup> 俾斯麦生前最为担忧的英、法、俄三国联合对德的格局导致欧洲均势的急剧变更和对抗局面的出现。

由于协约国集团控制了世界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它们结成联盟关系在经济严重依赖海外市场的德国无疑产生了灾难性的预期。这激发了威廉二世的德国以激进的方式守护自身经济崛起的成果，以及巩固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获取的世界市场份额的战略决心。但这种战略决心背后的利益诉求主要是防御性的自我保全，它首先不是为了改变欧洲本土的利益结构，更不是为了挑战和替代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① 莫瓦特编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2 卷），第 176—177 页。

② 霍布斯鲍姆 《帝国的年代》，第 86、413—415 页；莫瓦特编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2 卷），第 182—188 页。

③ 克雷格、乔治 《武力与治国方略》，第 59 页。

#### 四、美国“孤立主义”的经济根源 与体系内崛起的外部环境

美国选择了孤立于欧洲强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外，以周边为依托的崛起方式。不但如此，美国在其经济实力，甚至军事实力取得明显优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时期，并没有试图改变当时的世界秩序，更没有急于谋求霸主地位，而是刻意不让自己介入作为世界权力中心的欧洲（及其海外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事务。甚至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都避免担当全球主导者的角色，而只是维持一个“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崛起国”身份。与相对实力优势不明显，便急于在海外挑战既有国际秩序的德国相比，美国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崛起道路，这一反差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崛起国战略选择背后的动因和逻辑机制。

埃里奥特·科恩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的对外战略评价为“幼稚天真的战略”。<sup>①</sup>令人费解的是，较之同时代其他大国深思熟虑的对外战略，美国决策者仅仅凭借“特别幸运的幼稚天真”便轻易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这让人反思，美国的战略真的是“幼稚天真的”吗？一些学者把美国崛起后不急于全球扩张和确立世界霸主地位归因于美国特有的“孤立主义”文化现象和民族特性。<sup>②</sup>然而阿瑟·斯坦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实力与承诺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发生了根本逆转，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扩张不足（能力不受制约/承诺受到制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过度扩张（能力受到制约/承诺不受制约）。<sup>③</sup>不少学者从美国“例外论”的角度，将美国从“孤立”到“扩张”的对外行为视为随着相

---

① 埃里奥特·科恩 《幼稚天真的战略：美国（1920至1945年）》，载于威廉森·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456—494页。

②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③ 阿瑟·斯坦《国内制约、扩大威慑与大战略的不协调：1938—1950年的美国》，第93—118页。

对实力的变化，其特殊价值观的不同展现方式：孤立主义力图逃避参与国际事务，确保美国不要“世界化”；而扩张主义则要确保美国不受约束地参与国际事务，目的是使世界“美国化”，让整个世界合乎美国人的原则，进而变得像美国一样“美好”。<sup>①</sup>然而，对于美国对外战略这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解读，似乎无法解释为何美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亦即在获得“兼济天下”能力之后近半个世纪时间才彻底放弃了“孤立主义”对外政策，在海外广泛地承担霸主的责任。<sup>②</sup>扎卡利亚试图用“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理论解释1865—1896年间美国为何持续其孤立主义传统，及其19世纪最后几年的对外扩张战略。然而，该理论无法解释进入20世纪后，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在决策层和民众都清晰地感知自身具备主导世界能力的时候，美国政府为何在对外战略上主动选择了“孤立主义”。<sup>③</sup>在我们看来，“孤立主义”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美国对外战略选择的客观结果，而不是美国选择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崛起战略的原因。这一战略选择背后有其深厚的经济理性基础。

1820年左右，美国经济开始加速增长，并成功进入罗斯托所描述的“自我持续增长”的“起飞”阶段。<sup>④</sup>1870年，美国工业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1/4，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位；到1894年，美国以95亿美元的工业产值，占据工业世界第一把交椅。<sup>⑤</sup>到1914年为止，按制造业产

---

① 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端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沃尔特·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卡根试图从道德理想主义与物质利益诉求之间的关系角度理解美国20世纪前的扩张野心及行为。然而，他仍然无法有效解释美国作为一个秉持高度道德理想主义并且具有对外扩张天性的“危险的国家”，为何在其实力足以改变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时，却表现得如此被动和消极。参见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袁胜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③ 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门洪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④ 沃尔特·拉夫伯《美国人对机会的寻求（1865—1913）》，《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孔华润主编（石赋和刘飞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266页。

⑤ 沙伊贝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彭松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3、32页；祖波克《美国史纲：1877—1918》（庚声译），北京，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344页；黄安年《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4页。

出计算,美国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而且这种领先优势在“大萧条”时期以前不断攀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全球金融中心,其资本被视为国际经济体系的引擎,其军事力量也已具备世界霸主的条件。在大西洋的另一端,连年的战火不但破坏了欧洲主要地区的经济繁荣,而且逐渐瓦解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国家相对实力和国际地位正在迅速上升,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体。<sup>①</sup>自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原本可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这一点是美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共识。<sup>②</sup>然而,从工业革命实现经济崛起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美国一直没有主动试图改变美洲以外地区的秩序,其对外政策十分明确:避免卷入海外事务纠葛,不急于参与国际竞争。这段时期,美国在军事、外交以及其所热衷的价值传播方面实际投入的资源相当有限。

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美国增加了海军建设的投入,但在整个和平时期,其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仅为0.5%,远低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以1906年美元价格为标准来计算1870—1914年间各国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平均比重,英国为2.95%,法国为2.86%,德国为4.52%,意大利为3.15%,俄罗斯为3.32%,而美国仅为0.71%。<sup>③</sup>直至1880年,美国海军的规模仍比不上智利、巴西和阿根廷;1890年,美国陆军的世界排名仅位列14,次于保加利亚;虽然工业力量是意大利的13倍,但美国海军的规模却小于后者。按照乔治·凯南的说法,美国的外交政策在1898—1920年间方才形成。<sup>④</sup>在此前,美国几乎不出席任何国际会议,被世界当做标准的二流国家对待:1880年土耳其缩减其驻外机构,把驻瑞士、比利时、荷兰及美国的

---

① 入江昭《美国的全球化进程(1913—1945)》,《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孔华润主编(张振江和施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4页。

② 欣斯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第896页。

③ Nazli Choucri and Robert C. North, *Nations in Conflict: National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Violence*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 Co., 1975), p. 116.

④ 乔治·凯南《美国外交》(葵阳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

大使馆一并关闭；当时德国的一位驻马德里外交官，宁愿减薪也不愿被派驻华盛顿。

当回顾随后的 1913—1945 年间美国对外关系史时，我们发现美国仍然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中，以“孤立主义”的姿态处理其对外事务。在已经取得绝对经济优势之后的这段时间里，美国不但并未试图谋求霸主地位，而且避免承担世界霸主角色成为支配性原则，它不由决策者个人的性情或价值观念所左右和改变。奉行积极对外战略且以行为“冒进”著称的西奥多·罗斯福在任期间仅干预过一次欧洲的势力均衡。<sup>①</sup>而公认的在影响全球事务中最为理想主义的伍德罗·威尔逊及其政府也未能实质性改变美国在参与海外事务方面的保守倾向。

我们认为，工业化时期直至 20 世纪初的美国之所以奉行“孤立主义”对外战略，而没有选择挑战当时的国际秩序，是因为它一直有收益率更高的经济扩张机会。美国不仅在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过程中，在其推行扩张战略的美洲地区没有遭遇当时世界主要强国的强有力限制，而且还有效利用欧洲列强的冲突在欧洲地区获得崛起所需要的广义市场。进而，在经济甚至军事获得相对优势地位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在海外市场的贸易和投资行为仍然畅通无阻。“孤立主义”外交战略使美国及其商业精英集团获得的海外市场利润远高于参与国际事务并试图改变既有秩序的平衡状态可能带来的收益。这导致美国争夺霸权和承担世界主导者责任的动力明显不足。

美国最初是由 13 个殖民地组成的，国土规模不大、财富积累也不足够丰厚，不足以保证其通过市场购买获得足够的资源。美国的崛起所需要的资源主要通过领土扩张完成。在开放边疆的观念和政策指导下，美国通过赎买、兼并、侵占等多种方式迅速扩张国土面积，不断将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纳入联邦共和国主权所直接统辖的领地。1803 年，杰斐逊政府

---

<sup>①</sup> 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李庆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21 页。

以300万美元从拿破仑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1813年,美国通过武力手段占领了西佛罗里达;之后,通过1819年与西班牙签订的《横贯大陆条约》,美国赎买了佛罗里达6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同时还得到了有利的西部边界,使国家版图在一夜间抵达太平洋。1848年,凭借战争的胜利和150万美元的代价,美国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的广大领土。之后,美国又通过战争威胁和外交谈判的手段迫使英国让步,不但独占了俄勒冈,而且拥有了哥伦比亚河口三角地区,北部疆界一直延伸到太平洋。<sup>①</sup>美国通过军事、政治和商业等手段逐渐将周围领土纳入版图,使统一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之后通过南北战争消灭趋于落后的那部分生产方式,使得市场利用效率大幅提高,最大限度地通过内部扩张获得了经济崛起所需的广义市场,在资源供给方面尤其如此。

崛起时期的美国尚没有能力在美洲以外的地区推行任何形式的军事扩张。但我们需要注意到,其决策者之所以没有将国家力量更多地投入到军事能力的建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没有必要进行海外扩张的尝试。因为海外销售市场无论对于工业资本积累时期还是工业化时期的美国都从不是问题。美国充分利用了欧洲旷日持久的战争和经济领域的恶性竞争,将农产品和各种工业制成品出售给欧洲列强。<sup>②</sup>他们不仅向欧洲出售本国出产的几乎全部商品,而且把世界各地的商品运到欧洲,剩下不直接出口到

---

<sup>①</sup> 关于美国领土扩张的历史详见雷·艾伦·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周小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拉尔夫·亨·布朗《美国历史地理》(秦士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张友伦著《美国西进运动探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何顺果著《美国边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篇;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第23—166页;李庆余编著《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1页;西斯尔思韦特《1794—1828年的美国与旧世界》,C.W.克劳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9卷:动乱年代的战争与和平1793—1830),(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2页;有关西进运动另可参见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卷:农业时代),(许亚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59—603页;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上卷),(杨国标、张儒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40—463页。

<sup>②</sup> Samuel F. Bemis, *Pinckney's Treaty: a Study of America's Advantage From Europe's Distress, 1783 - 1800*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26).

欧洲的商品也大都运往西印度群岛的欧洲殖民地。<sup>①</sup> 美国商品的直接出口和转口贸易额不断翻倍，其海外市场规模急剧扩大。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促进了美国持续多年的繁荣，<sup>②</sup>

“孤立主义”对外战略原则不仅强调美国在政治上不介入海外事务和纷争、不试图挑战或改变既有的国际秩序和权力格局，它同时意味着在经贸领域最大限度地发展与相互冲突的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这正是美国崛起进程中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选择。它成功地使美国在欧洲连绵不绝的战争和恶性的市场竞争中成为最大的中立贸易国。大量海外资本的持续流入、国内工业资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都是在孤立主义外交的大环境中实现的。20世纪之前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大致可以被一部对外贸易史所涵盖。决策者们不遗余力并小心翼翼地维持并平衡美国同欧洲主要国家的贸易关系，并以机会主义者的姿态游刃于政治上彼此敌对、贸易上相互排斥的欧洲列强之间，力图挖掘其中的商业机遇以发展本国经济。

南北战争后，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sup>③</sup> 随着资本向制造业部门的不断转移，<sup>④</sup> 美国迅速发展的工业和国内剩余资本需要更多海外市场和有利的对外投资机会。这些需求主要被欧洲和美洲两大市场所容纳并消化，而一直没有遭遇市场阻塞。美国工业制成品的的主要出口市场是欧洲。

---

① 罗伯特·利普西 《1800—1913年美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斯坦利·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主编 《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卷：漫长的19世纪）（蔡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02页。

② Douglass C. North, “The United States Balance of Payments, 1790 – 1860”, in *Trend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19th Century*,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Vol. 2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③ 按照1879年的美元价格计算，1859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为8.6亿美元，1899年已增加到62.6亿美元；人均工业产值在这40年中大约增长了3倍。U. S. Census Bureau, *History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p. 139; 冈德森 《美国经济史新编》（杨宇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17—418页。

④ 福克纳 《美国经济史》（王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16—317页；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 《新美国经济史：从殖民时期到1940年》（罗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27页；诺斯 “美国的工业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第646页。

自 19 世纪 60 年代后期步入工业高速增长阶段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一直较为集中地在欧洲销售其产品。<sup>①</sup> 如下表所示，在进入 20 世纪前的几十年中，美国对欧洲的出口几乎一直占其出口总额的 80% 以上，其中一半以上商品的销售对象是其传统贸易伙伴英国；欧洲和美洲两大市场共消化了美国 95% 以上的出口需求。20 世纪开始的十几年中，尽管美国对外贸易的市场分布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其对欧洲的出口比例仍然占主导地位，欧洲和美洲两大市场仍然满足了 90% 以上美国出口商品的需求。

表 1 1869—1913 年按目的地划分的美国出口市场分布（包括转口贸易）

单位：%

时期	欧洲			美洲	
	总和	英国	德国	总和	加拿大
1869—1878	81	54	9	17	6
1879—1888	81	52	8	14	5
1889—1898	79	48	11	16	6
1899—1908	72	36	14	19	8
1904—1913	66	30	14	25	12

资料来源：U. S. Census Bureau, *History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U 317 - 334; Timothy Pitkin, *A Statistical View of the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nd ed. reprint (New York: A. M. Kelley, 1967), pp. 215 - 217.

海外市场交易渠道的通畅，让崛起时期的美国可以专心致志地将扩张重点放在周边区域。在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年代，美国在美洲事务中投入的精力远远多于世界任何其他地区。显然，“孤立主义”仅仅意指不干涉美洲区域之外的事务，而美国对其所谓“内政”的范围界定

<sup>①</sup> 吉尔伯特·菲特、吉姆·里斯 《美国经济史》(司徒淳、方秉铸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37—439 页；利普西 “1800—1913 年美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剑桥美国经济史》(第 2 卷)，第 503 页；沙伊贝、瓦特、福克纳 《近百年美国经济史》，第 214—217 页。



涵盖到整个西半球。<sup>①</sup> 美洲扩张战略对于美国的意义不仅在于该地区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市场和最主要的资本输出地，而主要在于美国需要一个地缘上相对封闭的美洲体系，以确保本国的安全和来自贸易的收入不被欧洲列强染指。

当时美国在美洲地区建立以其为核心的区域秩序的投入—产出比很高。从外部环境看，对身处混战状态的欧洲列强而言，美洲只是战略边缘地带。鉴于美国对控制西半球不可动摇的战略决心和强硬的外交立场，以及美洲国家政治结构的相对成熟，欧洲列强在该地区建立、维护及扩张势力需要耗费相当多的资源。西半球在欧洲主要国家看来已无继续留守或扩张的价值和必要，因此它们对美洲事务的干涉往往潦草收场。就区域内部环境而言，美国在美洲区域建立和维护秩序的成本较低。该区域没有其他竞争性大国存在，且国家间关系相对和谐。加之美洲国家独立后所制定的宪法多以美国宪法作为蓝本或深受其影响，<sup>②</sup> 因此美国作为“西半球的保护人”及“美洲自由的模范之邦”，具有较为坚实的历史基础。<sup>③</sup> 在以上成本收益的经济逻辑支配下，门罗主义对美国的崛起战略做出了最佳诠释：一方面在周边进行领土内部化扩张，在整个美洲区域扩大势力范围并谋求区域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美洲区域之外采取防御性质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随着美国实力渐强，美洲区域内绝大多数国家以及区域外大国都默认了门罗主义原则所构建的美洲秩序，<sup>④</sup> 以致美国在西半球确立的势力范围和构建的美洲体系几乎没有遭遇哪怕是温和的挑战。<sup>⑤</sup>

除了立足于欧洲和美洲两大市场之外，美国也参与到 19 世纪末期海

---

① 李庆余著《第一次重分世界》，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20 页；杨卫东《扩张与孤立：约翰·昆西·亚当斯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6—147 页；塞缪尔·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 1 卷），（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198—213 页。

② Howard Cline, *Mexico: Revolution to Evolution, 1940 - 196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7.

③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8 页。

④ 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 1 卷），第 228 页。

⑤ 欣斯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1 卷），第 871 页。

外扩张的世界潮流之中，试图在更多地区扩展其销售市场。<sup>①</sup> 斯特朗和马汉等人倡导的通过海洋扩张促进贸易的思想也产生于这个时代。<sup>②</sup> 时任 NAM 主席的亨德里克斯曾坦言：盎格鲁—撒克逊人扩大市场的欲望同样在美国人身上膨胀起来。<sup>③</sup> 然而，即便如此，美国当时海外扩张的尝试并没有挑战主要国家的既得利益，它试图在列强争夺的边缘地带扩展市场，在不受关注的情况下获取利益。

显然，美国对于海外市场的需求远没有达到同时期德国那样，必须通过改变和重新分配现有国际利益格局来实现的程度。美国在 19 世纪末期的海外扩张主要体现为，在被欧洲强国视为边缘利益的拉美和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建立并巩固其市场优势。<sup>④</sup> 美国在美洲大陆之外的扩张重点是太平洋地带，特别表现在夏威夷和萨摩那地区。<sup>⑤</sup> 在欧洲主要强国重点扩张的中东、非洲和远东市场，美国几乎没有与它们直接角逐并产生摩擦。<sup>⑥</sup> 尽管在 19 世纪末通过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的控制权，并且试图同日本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但是美国选择的这两个海外竞争对手都不在世界强国之列，它们或已退出、或尚未进入列强的视野，因此这些冲突并没有触动当时主要大国在海外的利益分配格局。在美西战争中，鉴于与美国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欧洲大陆

---

①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5 章；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卷），第 21 章；阿瑟·林肯·威廉·卡顿《1900 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卷），（刘绪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 章；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第 167—228 页。

② 参见 A. T. 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安常容、成忠勤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 Charles Hoffman, "The Depression of the Nine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6, No. 2, 1956, pp. 156 - 157.

④ Jules Davids, *Americ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enetration of Mexico, 1877 - 1920* (New York: Arno Press, 1976); Lester D. Langley,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Mediterranean: United States-European Rivalry in the Gulf-Caribbean, 1776 - 1904*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76); Joseph Smith, *Illusions of Conflicts: Anglo-American Diplomacy toward Latin America, 1865 - 1896*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9).

⑤ 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第 197—332 页。

⑥ 欣斯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1 卷），第 863—864、872—873 页。

各国和英国都不愿为维护西班牙的利益而反对美国，因此都迅速达成中立协议，以免危害本国同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往来。<sup>①</sup>

19世纪末期开始，美国的经济崛起及其海外扩张行为建立在与当时的海上霸主及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英国之间和解关系的基础上。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后，英美两国都积极谋求建立彼此之间较为密切的关系。德国的潜在威胁使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的对外政策，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求盟友。鉴于美国巨大的经济力量和日渐增长的军事实力，特别是美西战争后其国际地位的提高，英国希望团结其力量。即使塔夫脱和威尔逊政府所推行的咄咄逼人的西半球外交也没有破坏英美关系的和解趋势。<sup>②</sup>在不影响自身在海外重要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美国非但避免挑战英帝国的霸主地位，而且对其在全球业已确立的殖民体系予以支持。美国决策者尽管一贯口头上支持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却公开鼓励伦敦挫败印度土著居民要求独立的愿望，还声称说独立只有经过长期教育使当地居民充分“适应”和“开化”能进行自我统治后才能提上日程，甚至称赞英国在埃及的殖民活动是“伟大的文明事业”。与之相应的是，英国坐视了崛起的美国在其战略边缘地区的扩张和在美洲建立区域霸权。<sup>③</sup>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中以及战后，主动放弃发挥大国政治作用对美国而言同样是遵循经济理性的战略选择。当1914年战争在欧洲爆发时，美国最初的反应是继续共和国早期的“孤立主义”原则，以中立国的身份与所有交战国的贸易往来。美国坚持中立立场的实质目的是利用欧洲国家的战争从事横跨大西洋的贸易和金融活动，并借机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扩大其市场份额。在海外利润的诱惑下，美国政府及其商

---

① 欣斯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第896页。

② 关于英美和解参见 Bradford Perkins, *The Great Rapprochement* (New York: Atheneum books, 1968); Alexander E. Campbell,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95 - 1903*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60); Charles S. Campbell, *Anglo-American Understanding, 1898 - 1903*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7); *From Revolution to Rapproch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1783 - 1900*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74)。

③ 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第324页。

业精英阶层不愿直接卷入战争。在他们看来,政治上维持“孤立”的对外战略显然远比投入到世界霸权的争夺中收益更高。从结果看,战争初期的孤立主义政策令美国的海外市场份额迅速扩展,战时的中立贸易令整个世界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当欧洲各国不得不向美国寻求长期贷款以维持其购买力时,美国迅速从债务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凭借战时中立政策在世界贸易和融资领域获得的地位,华尔街在战后成为世界金融中心。<sup>①</sup>

美国贸易和船运的扩张并不局限于欧洲。当战争导致欧洲的商船从亚洲、中东和拉美等地消失后,满载本国和外国货物的美国商船很快遍布全世界,替代了欧洲国家在这些地区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由于这一时期新兴工业化运动在亚洲和拉美相继出现,因此越来越多的美国资本流向这些地区,投资当地的银行、铁路和工厂,在商业上占据先机。

美国最终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源于商业利益受阻,而不是为了进行霸权争夺。随着战争升级,在英国和德国的双重军事压力下,美国中立的立场不但难以持续,而且其欧洲市场面临阻塞。为了阻止美国向德国运送物资,英国先是将禁运品的范围扩大到食品、医药等非军事物资领域。<sup>②</sup>进而,英国对德国和中立国设下漫长的海军封锁线,并开始截获美国运往德国的某些非禁运品。英国的军事封锁导致美国对同盟国的出口贸易额到1916年时迅速下滑到仅116万美元。不过,美国与同盟国贸易额的明显下降在其与协约国贸易额的急剧上升中获得充分补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英美之间的利益纠纷。<sup>③</sup>然而,随着战争向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美国决策者和商业精英阶层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来自商业利益方面的

---

① 入江昭《美国的全球化进程(1913—1945)》,《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2—24页;林克、卡顿《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卷),第400页;齐世荣等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兴衰史》(下卷),第812—813页;巴里《20世纪美国的对外金融关系》,《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第349—253页。

② 入江昭《美国的全球化进程(1913—1945)》,《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8—21页。

③ 林克、卡顿《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卷),第196页。

威胁，他们尤其担心德国可能通过中断跨大西洋贸易而对美国经济利益造成严重破坏。<sup>①</sup> 1917年初，德国潜艇开始攻击横跨大西洋的美国商船，并声称如果美国不迫使英国遵守关于中立贸易的国际法，德国将可能再次发动更强大的无限制潜艇战，不断击沉美国运往协约国的商船。<sup>②</sup> 德国此举直接导致美国于4月6日对德宣战。美国通过战争参与欧洲事务纠纷，其中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胜于地缘权力方面的追求。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短期经济原因是，在英德两国的军事封锁或打击的压力下，通过中立贸易维持欧洲市场的路径严重受阻；长期顾虑则来自德国称霸后可能对美国海外商业渠道的破坏。

一旦经济利益方面的障碍和隐忧被解除，美国便立即从世界事务的舞台退回到霸权争夺的看台上。这一点在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中得以体现，它同时从侧面印证，美国参与欧洲大国间的纠纷主要源于经济上的原因，而不是为了争夺霸权或谋求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如果说在战争过程中，以最大限度获取海外收益为目标的孤立主义政策起主导作用的话，那么战后这种力量在美国更体现出压倒性的优势。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综合实力上已经取代欧洲诸强成为世界的中心，但是美国社会的主流并没有意愿去扮演世界主导者的角色。既然战后美国的海外市场已恢复其先前畅通无阻的状态，那么构建世界秩序并为之承担责任的构想对于精英阶层和社会主流便缺乏吸引力。这种现实利益的考虑有效压制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美国人将自身制度和观念进行普世推广的热情。

《凡尔赛和约》及其系列附属国际条约所组成的《巴黎和约》在美国国内获得怎样的对待，是对美国是否要担当世界领袖的考验。然而，这一由威尔逊倡议并可能在未来主导世界秩序的构想在美国国内遭遇强大的阻力和挑战。以洛奇为首的39位参议员草拟了一份联名声明，要求在原始和约基础上附加15条以逃避国际义务为目的的保留条款，其中包括要求

<sup>①</sup> 罗伯特·阿特 《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

<sup>②</sup> 林克、卡顿 《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卷），第196—207、214—218页；入江昭 《美国的全球化进程（1913—1945）》，《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6—37页。

美国有退出国联的自由、不承担保证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义务、对门罗主义有自己做出解释的自由等。洛奇本人属于强硬的海外扩张派，是对美国参与海外事务秉持相对积极态度的政治代表。与之相比，议会中的孤立主义者更不希望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并承担义务，反对任何带有国联盟约条款的国际条约。这些不同力量集结成强大的同盟反对威尔逊版的巴黎和约。最终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是，无论附有洛奇保留条款的和约或未附保留条款的原始和约均遭到否决。<sup>①</sup> 这充分体现出，在海外商业利益渠道畅通的情况下，美国主流精英和社会大众对于获得并承担世界领导地位持冷淡甚至排斥态度。直至 20 多年后，通过主导国际机制获得世界领导权的利益驱动力在美国方才形成。

在停战和大萧条之间的年代里，美国决策者认为本国海外商业利益无虞，避免承担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哈定上台后旋即表示，他的政府“肯定而坚决地放弃加入国联的一切想法”，并且“不提议从旁门、后门或地下室的门进去”。<sup>②</sup> 他在就职演说中明确声称“我们不打算被连累。”随后，美国分别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签订和约。这意味着美国实际上解除了它与协约国一起制定并签署的巴黎和约中需要承担的责任，不再为制止未来扰乱和平的行为做出任何保证。与此同时，由于战后海外市场遭遇挑战的威胁下降，美国不愿继续付出高昂的代价来扩展海军力量，哈定政府签订了《五强海军条约》和《四强协定》以控制海军发展并开始裁军。参议院在 1922 年 3 月同意批准《四强协定》时坚持声明：美国“不投入武装力量、不结盟、不承担参加任何防御的义务”。<sup>③</sup>

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愿意承担构建世界经济

---

① 详见入江昭《美国的全球化进程（1913—1945）》，《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62—72 页；林克·卡顿《1900 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卷），第 243—246、259—267 页；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第 406—412 页。

② Samuel F. Bemi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5th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5), p. 657.

③ 入江昭《美国的全球化进程（1913—1945）》，《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67 页；林克·卡顿《1900 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卷），第 398 页。

和安全秩序的责任。美国被推上世界事务的舞台，是由于欧洲经济实力在战争期间消耗殆尽，而美国趁势成为债台高筑的欧洲国家和落后地区寻求资金的主要来源。<sup>①</sup> 截至 1929 年，迅速崛起的美国已占据世界国民收入的近 50%，工业总产量的 40%、世界黄金储备的半数以上，以及国际贸易总额的 16%。<sup>②</sup> 这种世界经济力量平衡的根本变化，要求美国在建立一种可行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方面起领导作用，带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局。然而，美国政府却未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来阻止全球经济大崩溃。美国坚持在孤立的状态下解决自身的经济与财政问题，并且无视政府间的债务和赔款这一战后国际经济和安全体系中最有可能引发动乱的危险因素。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不但没有降低关税使欧洲国家有可能通过商品贸易偿债，反而提高了关税税率以实施严苛的贸易保护。<sup>③</sup> 在金德尔伯格看来，导致 1929—1933 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在事实上已丧失管理国际体系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国具备这一能力，却没有扮演全球霸主角色的意愿，不愿承担稳定国际经济体系的责任。<sup>④</sup>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亦即取得争夺霸主地位的实力半个世纪之后，美国才认为确立全球霸主地位，在美洲之外的地区建立安全、经济体系，并承担广泛的霸主责任是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对外战略。这显然不仅是一个认知问题，也是现实利益环境改变的结果。

## 五、对中国崛起战略选择的启示

从工业化时代的历史经验看，崛起大国对扩张性战略的偏好似乎得到

---

① 林克、卡顿 《1900 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卷)，第 400 页。

② 入江昭 《美国的全球化进程 (1913—1945)》，《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85—86、107 页。

③ 莫瓦特编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2 卷)，第 910 页；林克、卡顿 《1900 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卷)，第 400 页。

④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1929—1939 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

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持。世界主要大国，如殖民时期的英国、西班牙和法国，20世纪前的美国，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它们崛起的努力过程无一例外地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扩张性质。尽管这些国家扩张的具体形式不尽相同，扩张的地域有的选择在周边、有的定位于离岸地区。由此引申的地缘政治逻辑导致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战略的担忧。在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会不会主动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以及在其地缘所属的东亚地区是否会选择扩张性的战略，这些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可以说，中国最终能否以和平的方式在全球和东亚地区寻求到相称的地位，已成为这个时代国际政治理论需要回答的核心命题之一。<sup>①</sup>

依照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崛起进程中的中国与全球霸主美国之间的武力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悲剧。<sup>②</sup> 权力转移理论的追随者们尽管并非众口一词地判定中国未来必然发动霸权战争，但他们大多悲观地认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大，除非美国在现有体系之内有效容纳中国的崛起并成功对中国进行从制度到观念的整合，使其成为一个“满意的”大国。<sup>③</sup> 自由主义学派和其他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与世界及周边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国际（地区）制度建设

---

①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97; M. Taylor Frave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China's Rise: Assessing China's Potential for Territorial Expans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2, No. 4, 2010, p. 505.

② John J. Mearsheimer,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Vol. 105, No. 690, 2006, pp. 160 - 162;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4, 2010, pp. 381 - 396.

③ Douglas Lemke and Ronald L. Tamme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9, No. 4, 2003, pp. 269 - 271;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R. Thompson, "Power Transition, Challenge and the (Re) Emergen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9, No. 4, 2003, pp. 315 - 342; Jacek Kugler, "The Asian Ascent: Opportunity for Peace or Precondition for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7, No. 1, 2006, pp. 36 - 42; Ronald L. Tam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1, 2006, pp. 35 - 55; Avery Goldstein, "Power Transitions, Institutions, and China's Rise in East Asia: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 2007, pp. 639 - 682; 利维 “中国崛起与权力转移理论”。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中国选择武力扩张方式崛起的可能性。<sup>①</sup>然而,就这些研究的内在逻辑而言,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只是为中国选择扩张性战略的意图和倾向增加了成本约束而已。一些学者试图从传统文化观念角度证明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讲求和谐关系的国度,并由此得出中国在其崛起进程中不会像当年的西方强国那样采取对外扩张行为的结论。<sup>②</sup>但是,各种基于文化及观念特性的阐释显然并没有缓解外部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诸多疑虑。基于古代传统文化偏好为现代中国崛起的非扩张性所做出的种种辩护难以令西方世界和中国的近邻感到信服。

以上几种解释都没有将中国的崛起战略看做是立足于其工业化需求的理性选择。依据大国崛起战略选择背后的经济逻辑,大国在财富积累阶段的不同选择取决于不同策略之间的成本收益差距,基于利益的驱动。如果具有获取经济利益的良好机会,崛起国即使在获得很大的实力优势之后,

---

① Kang 从体系分析角度对中国在东亚的崛起环境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尽管不希望中国的力量介入所有领域,但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关系使东亚国家没有动力积极地制衡中国;这些国家更多关注在中国的经济机会而非军事威胁,因此更希望中国强大而不是虚弱,对于中国成为地区主导国家的态度主要是接受而非恐惧。参见 David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贺凯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相互依赖”这一变量运用于新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中,认为由于与亚太地区国家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将倾向于通过制度制衡而非传统军事同盟制衡的战略来应对威胁,这将提高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参见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关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与国际制度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的文献另可参见 Thomas G. Moore and Dixia Yang, “Empowered and Restrain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91 – 229; Alastair I.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 – 200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约翰·伊肯伯里 《中国的崛起: 权力、制度与西方秩序》, 《中国崛起: 理论与政策的视角》,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② 参见刘志光 《东方和平主义: 源起、流变及走向》,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2 年版; Hua Shiping, *Utopianism i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Wang Qingxin Ken, “Cultural Idealism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 Vol. 27, No. 77, 2001, pp. 126 – 147; Zhang Yongjin,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5, 2001, pp. 43 – 63; Zhang Tiejun,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 No. 2, 2002, pp. 73 – 80; William A. Callahan, “Remembering the Future: Utopia, Empire and Harmony in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ational Relations*, Vol. 10, No. 4, 2004, pp. 569 – 601。

也不一定会对现有霸主发起挑战。

与工业化历史上的其他崛起大国相比，中国自身拥有庞大的、不同层次的内部消费市场，这一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巨大潜力尚未被充分开发。与此同时，作为世界加工工厂，中国的生产是依据并迎合世界各国的偏好和需要而进行的。体现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工业产品巨大需求的各种订单源源不断涌入中国的企业和工厂。凭借生产要素方面的综合优势，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在世界市场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因此，在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经济崛起所依赖的销售市场可以在全球范围通过自由交易的方式获得，并能通过商业竞争的方式实现自发扩展，而不需要借助其他强制性的扩张手段。

与西方大国崛起阶段的外部环境相比，崛起中的中国在外部世界获得能源和资源的成本要高昂得多。无论就其购买价格还是可获得性而言，中国未来所面临的资源、能源风险都高于其他市场风险。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在能够解决自身经济起飞所必要的资源、能源需求，或在可能拓展资源、能源运输途径的地区扩大影响力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尽管世界资源、能源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对称依赖现象，而且这种不对称依赖的结果往往导致中国在议价权方面处于被动，<sup>①</sup>但是在现有的市场机制下，中国通过交易手段获得崛起所需要的资源、能源仍然是最有效的选择。

对于外界最担忧的问题之一，即中国在所属的东亚地区是否会采取扩张性战略，我们也可以运用本文的框架进行分析。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市场交易畅通，中国发展的能源、资源需求主要不是依靠其地缘所属区域。因此，作为中国的周边和近邻，东亚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作用与当年美洲对于美国来说比较相似。中国在这一地区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是防御性的，即守住现有的崛起成果。然而，与当年的美国相比，崛起的中国在东亚地区采取扩张战略在经济学意义上是缺乏效率的。一方面，作为全球霸主，美国的战略重心之一是防止出现离岸的地区霸权，这一战略目标显著地增加

---

<sup>①</sup> 高程 《中澳双边贸易中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分析》，《当代亚太》2008年第2期。

了中国在东亚扩张的成本。另一方面，尽管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东亚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中持续投入，但是从目前的效果看，成本和收益高度不对称。由于美国的存在，周边国家对美国崛起的担忧很容易转化为行为上的敌对，以至于中国稍有积极作为的倾向，这些国家便做出比较强烈的反应。这在客观上进一步提高了美国在该地区扩张影响力的投入—产出比。因此，中国在崛起阶段，通过扩张性手段主动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类似美国在西半球建立的美洲体系在经济学意义上不是有效的选择，它不符合成本—收益最大化的逻辑。从长远趋势看，崛起中的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权力来源更可能是建立在市场交易行为中产生的结构性权力基础上，<sup>①</sup> 它主要通过东亚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关系而获得。这一方式的成本显然低于通过军事手段在东亚进行势力扩张，或与美国在该地区争夺主导地位的成本。

尽管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倾向于选择通过市场交易的自发扩展及和平竞争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崛起目标，但是这一崛起战略在未来能否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所施加的压力程度，特别是这种外部压力给中国造成的客观影响及心理预期。从某种程度上说，虽然在垂直化生产模式下收益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现象，但中国仍然是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受益者。至少，现有国际体系目前尚未阻碍中国经济崛起的大方向和路径。当现有的国际体系能使中国通过市场交易行为获得国内增长所需要的市场和资源时，中国就没有动力去挑战既有的秩序及其基本利益格局。当外部的政治压力不足以抑制其经济力量的发展势头时，中国会倾向于选择温和的崛起方式。反之，当经济崛起的进程受到外部强劲的阻力，现有的经济成果被认为难以守住时，中国将可能被迫采取更为强势的方式来维持其实力的发展，甚至可能选择较为激进的对外战略，以确保自身的经济崛起进程。

---

<sup>①</sup> 关于结构性权力，参见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杨宇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 作者简介

高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

电子信箱: gaocheng@cass.org.cn

吴日强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候选人;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2010/2011年核安全学者; 2009/2010年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全球安全工作组访问学者。

电子信箱: wu.riqiang@gmail.com

王石山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2009级研究生。

电子信箱: shishan571@163.com

王英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教授。

电子信箱: swdx188@sina.com

漆海霞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讲师。

电子邮箱: qihaixia@mail.tsinghua.edu.cn

周方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

电子邮箱: zhoufangyin@gmail.com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电子邮箱: yanxt@mail.tsinghua.edu.cn

花勇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候选人。

电子邮箱: huayong1979@163.com